

## ※ 文哲譯粹 ※

# 明治時代的學術用語

沈國威\* 著 任鈞華\*\* 譯

### 一、緒 言

明治時代，是引進新式知識的時期，也就是從過去江戶時代以漢學、蘭學為主的學術體系全面轉向近代西學的時期。

新的知識需要新的文體和表現手法，而且更需要新的詞彙。明治時代，特別是明治二〇年代以前，人們創造出大量的新詞、譯詞作為學術方面的用語。在這些詞彙裏，例如西周所造出而至今仍在使用詞彙，在雙字詞方面，比例不超過兩成（見後述），而《哲學字彙》（1881）大致也是這樣的比例。這雖然讓人覺得明治的學術用語已成了古典語，但是在今日，這些詞彙有很多不但被用在學術領域，在一般的社會生活上也成為不可或缺的基本用語。

本文的目的，在於概觀「明治時代的學術用語（以下略稱為學術語）實際上是如何形成」。不過，即使用「學術語」這一句話來概括，但自然科學的用語和人文科學的用語仍有相當大的差異，而且明治時代和現在，專門性的程度也不一樣。本文所探討的範圍不在於各專門領域的高深術語，而是限定在進行學校教育或知識活動上廣泛使用的詞彙，特別是把重心擺在文科用語上做進一步的討論。

---

原文〈明治の學問の用語〉，收入《日本語學》第22卷第12號（2003年12月），頁34-44。本文的翻譯承蒙作者授權，謹此致謝。

\* 沈國威，日本關西大學外國語學部教授。

\*\* 任鈞華，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 二、繼承和創造

明治的學術語，有以下特徵：

(一) 歷史較短的新詞、譯詞。部分詞彙的典故出自漢籍，但不是漢籍裏的舊意義，而是作為譯詞後被賦予的新意義。

(二) 為了表現西洋傳來的文物、制度而被創造出來。換言之，東、西雙方的文化交流以及由此而來的語言接觸是學術語誕生的誘因。

(三) 幾乎全是取自漢語形貌的詞彙。江戶時代以降，漢語成為談論學問的語言。外來的概念往往被譯成漢語，人名、地名及其他音譯詞也沒有例外地被賦予漢語的詞形。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明治後期<sup>1</sup>。

(四) 有很多詞彙的形貌和漢字文化圈裏的其他語言相同（這些形貌相同的詞彙被稱為「同形詞」）。例如，在四千個中國報紙的常用詞彙裏，和日語同形的複合詞達一千八百個以上，占全體兩千九百五十個複合詞的 62%<sup>2</sup>。大量同形詞的存在，說明了詞彙的交流是多麼興盛。這也意味，在漢字文化圈裏，近代語的成立並不只是一個國家、一種語言裏面的問題。

明治的學術語，依其起源，可分成：1. 江戶時代原有的詞彙。2. 蘭學的譯詞。3. 漢籍語、佛典語、白話小說的詞彙。4. 中國漢譯西書、英華辭典的譯詞。5. 明治時代的新造詞等五大類。

源自江戶語的學術語，可以舉「取締」、「引渡」、「場合」等法律相關用語為例，但總數並不多。江戶時代蘭學的譯詞，係指經由荷蘭引進西洋知識之際，在翻譯荷蘭書籍的過程所創製的譯詞、術語。從領域來看，以醫學、植物學、化學、兵學、砲術為主，特別是解剖學、眼科、婦產科、外科的基礎術語在幕末都已基本完成<sup>3</sup>。

不論是江戶時代荷語的翻譯，或是明治初期英語的翻譯，中國書籍始終是最大的供給源。根據手島邦夫的調查，在西周所使用的雙字漢語的一千三百二十五個譯

<sup>1</sup> 飛田良文：〈外來語の取り入れ方の變化〉，《日本語學》第 17 卷第 5 號（1998 年 5 月），頁 29-38。

<sup>2</sup> 在此且忽略和舊字體、新字體、中國簡體字等字體上的不同。

<sup>3</sup> 大鳥蘭三郎：〈我醫學に使用せらるゝ解剖學語彙の變遷〉，《中外醫事新報》（1932、1933 年），頁 1189-1193。

詞裏，典故出自中國書籍者就占了近七成<sup>4</sup>。然而，如前所述，即使是典故出自漢籍的詞彙，很多在意思上未必跟漢籍的出處有關。

中國漢譯西書的譯詞，可分為十六至十八世紀耶穌會士的譯詞和十九世紀以降基督教傳教士的譯詞。然而，除去個別領域的詞彙，直接從耶穌會士著作採用過來的詞彙其實很少，大部分的詞彙都是透過基督教傳教士的著作而傳入。而英華辭典也提供許多譯詞。

明治的學術語裏，在幕末到明治初才被造出的新詞彙，在數量上大為增加。譬如，據前述手島的調查，西周的譯詞裏被認為是幕末到明治初期的新造詞彙，在全數一千三百二十五個譯詞裏就有三百一十個，約占 23%。手島指出，這兩成多的新詞「可說是純粹的字根創造……大量的新詞被造出、被使用」。

明治的學術語，係經歷此繼承和創造的過程而成形。

### 三、「借」與「譯」

採納外來的概念，大凡有兩種方法，即「借」與「譯」。「借」有「借音」和「借形」之別。借音的詞彙又可稱作「音譯詞」，藉由音的轉寫，把來源語 (source language) 的音納入母語裏。借音主要在不同表記體系的語言間進行。相對於此，借形則常出現在相同表記體系的語言間（還包括表記體系只有部分相同的語言）。實際上，使用羅馬字母的歐洲各語言間存在著許多這樣的先例，例如英語中從法語或德語借來的詞彙。另外中國、日本、朝鮮半島等漢字文化圈的詞彙交流也可說是借形的好例子。文字是記錄語音的記號。因此，借形裏面必然夾雜著語音。在表音文字裏，這種情況尤其明顯。所以筆者認為，歐洲各語言之間透過書籍所進行的詞彙交流，與其說是借音，不如說是借形才對。

「借」不管是借音或借形，基本上不會伴隨意義的轉移。要給新詞賦予意義，須藉注釋或釋義等方法才能實行。例如，幕末、明治初期，附在從中國漢譯西書借用過來的詞彙旁的「旁注假名」，就扮演了這類注釋的角色。理論上，「借」在最大限度上是有可能接近原詞的意義，不過意義的傳布和固定則需要長時間。然而，

<sup>4</sup> 手島邦夫：〈西周の新造語について——「百學連環」から「心理說ノ一斑」まで〉，《國語學研究》第 41 號別冊（2002 年），頁 1-13。

特別要說的是，這應該是向漢字之類的表意文字借形的情況。漢字在歷史上是漢字文化圈裏共有的帶有意義的記號體系，因而在漢字借形詞方面，就容易陷入意義能同時轉移的錯覺。不過字義不一定和詞義有直接的聯繫，而且漢字在漢字文化圈各語言間形成了獨自的意義和用法，因此就會產生漢字借形詞的意義誤導人們偏離來源語的詞義的危險性。特別是在引進的初期，這種現象最為明顯。

另一方面，「譯」是藉翻譯的手法把來源語的概念置換為母語，有直譯（詞素對應譯）和意譯之別<sup>5</sup>。

「譯」要同時把意義轉移是有可能的，但是要把來源語的獨特概念，正確無誤地翻譯到母語來，則需要耗費大量的精力與時間，有時甚至覺得是不可能達成的。對來源語的造詣越深，這種不可譯的問題就越嚴重<sup>6</sup>。

#### 四、借的魅力——漢譯西書譯詞的借用

日本在締結日美修好通商條約後，一八五九年開放神奈川、箱館和長崎三個港口，大量進口中國的漢譯西書和英華辭典。又如一八六二年千歲號遠航上海所象徵的——日本派遣人員到中國積極收集書籍，漢譯西書和英華辭典，就以原來的形貌或是透過翻印、翻譯的手段而被廣泛利用<sup>7</sup>。在這過程中，漢譯西書的詞彙被日語「借」過去了。幕末英語學尚未確立而不得不仰賴漢譯西書、當時的譯者具備高度的漢學素養、國際情勢緊迫因而沒有多餘時間從事翻譯等，都是產生這個現象的理由。在還沒有合適的英日辭典的幕末、明治初期，學者們把英華辭典擺在桌上，致力於翻譯，而且許多英日辭典的編纂乃參考自英華辭典的情況，也加快了日本借用中國製譯詞的速度。借用最大的優點，便是在創造譯詞上節省了時間和勞力。這樣才能短時間引進大量譯詞，並迅速把新的概念轉化成詞彙（即所謂的「概念的詞彙化」）。然而對許多讀者來說，未必了解這類借用詞的意義。如前所述，為了打破意義上的隔閡，就附上行間小注和旁注假名。特別是旁注假名的存在最為重要。明

<sup>5</sup> 但是，一般不會把意譯詞當成狹義的外來語。

<sup>6</sup> 當然，由「譯」所造出的詞，也未必保證意義會轉移。如果概念本身難以捉摸，就必須靠注釋來說明。但這種場合，就算是用語的問題，也已不是譯詞的問題了。這在母語的場合也會發生，想一想各種百科辭典、術語辭典就能明瞭。

<sup>7</sup> 沈國威、內田慶市：《近代啟蒙の足跡》（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02年），頁1、2。

治二〇年代以後，才不在英日辭典的譯詞旁附上假名。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此即漢譯西書的譯詞取代既有譯詞的現象。例如，幕末已經固定存在的「舍密」被「化學」取代，「越列機」被「電氣」取代。其他尚有「積極、消極→陰極、陽極」、「健全→衛生」的例子<sup>8</sup>。以之填補譯詞的空白處似乎不是借用的唯一理由。像這樣把譯詞統一成中國書籍上的用語的意圖，從《曆象新書》(1792-1802)上、中篇和下篇裏的譯詞更動便能看出。換言之，比起譯詞意義的正確，人們更重視的是漢字詞本身。這也是去借用中國製譯詞的重要原因。

## 五、向翻譯挑戰

幕末、明治的知識分子，藉著英華辭典和漢譯西書，短時間之內獲得英語的知識及許多譯詞，在學問體系上完成從蘭學到英學的轉換。不過，漢譯西書主要是數學、地理學、天文學、醫學和植物學方面的譯書，能提供的譯詞自然屬於這幾種學問的用語。尤其人文科學的領域裏沒有可供參考的漢譯西書，同時蘭學裏缺乏這類詞彙，而漢學的用語也不能原般照用，因此人文類的學術語，非得自行創造不可。

關於新詞、譯詞，必須從「是誰在什麼時候以什麼方法造出」、「最初在何種書籍裏使用」、「經歷怎樣的過程而定型」等角度來究明各自的語史。但是，因為跨越眾多學科且詞彙數量龐大，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始能完成。《日本國語大辭典》(小學館第二版，2002)裏，有五百多個以學術語為中心的近代漢字詞附有語史欄，當然這只是個開端而已。在此簡單討論一下人文類學術語的創造和普及的問題。

人文類學術語的創造，始於近代日本的知識分子對日本社會的啟蒙活動。以福澤諭吉的《學問之勸》和《西洋事情》為首的眾多啟蒙書籍問世了，書中嘗試用新用語、新文體來表達西洋的新概念。

和這種啟蒙動向同一時間，學院派對學術語的構想也正式展開。眾所周知，是由西周、津田真道、井上哲次郎、中江兆民、加藤弘之等人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在普及面上，《明六雜誌》(1874-1875)很是關鍵。《明六雜誌》雖然刊行時間不長，

<sup>8</sup> 沈國威：〈漢語の育てた近代日本語——西學東漸と新漢語〉，《國文學》第41卷第11號(1996年9月)，頁80-86。

但使用哲學、心理學、進化論、政治、經濟等社會科學各領域的新詞，帶給學界巨大衝擊。而其成果則展現在《哲學字彙》(1881)裏。

《解體新書》(1774)曾明言翻譯有三種方法：「翻譯（由既存語——主要為漢籍語的意譯）」、「義譯（詞素對應譯）」<sup>9</sup>和「直譯（音譯）」，這也可當成是蘭學者創造譯詞的三個原則。使用漢籍語的「翻譯」，是蘭書翻譯的基本。「義譯」的比重也因外語知識的進步而增加。譬如《重訂解體新書》（1798年著成，1826年刊行）裏就有「名義解」之卷，並展示了對拉丁文在內的原詞所作的詞源分析以及基於此的許多「義譯詞」。

明治時代的翻譯，基本上符合蘭書翻譯的三原則。舉例來說，在既有的漢籍語使用上，《哲學字彙》的凡例裏，有「譯字……博參考儒佛諸書而定」，實際上也多用行間小注以明記出處。從詞根分析原詞而構思出譯詞的這類詞素對應的「義譯」之例，有很多跟下面的一樣：

心理學，是從英語“Psychology”、法語“Psychologie”、希臘語“Psyche”即「魂」、「心」的意思和“logy”即「學」的意思而來（《生性發蘊》，頁30）。

第二，對於國家，有以“Political Legitimation”來形容。“Political”是政治的意思，“Legitimation”是正統或嫡系的意思。現在暫譯作「政統」（《文明論之概略》，卷1，第2章）。

這種詞源分析，在《英獨<sup>10</sup>法和哲學字彙》（《哲學字彙》的第三版，1912）被徹底運用。另一方面，用訓讀來構思成語、用訓讀來代替音讀以調整漢字詞的詞形，這類的譯詞創造法也被使用了<sup>11</sup>。例如，拿西周在原稿階段的表現和在著作所用的譯詞相比，便可發現其痕跡。

明治時代的學術語在詞形上的特徵，是漢字詞的數量占壓倒性多數。《哲學字彙》沒有用外來語；《言海》(1891)裏，三萬九千一百零三個詞條只有兩百六十四

<sup>9</sup> 譯註：《解體新書》裏的「義譯」包含今日所謂「直譯」（詞素對應譯）和「意譯」兩種情形。作者在此是著重其「直譯」之情形。為保留《解體新書》的原用語，譯文中沿用原文的「義譯」和「義譯詞」。

<sup>10</sup> 譯註：獨（独），為日文詞彙「獨乙」（「独逸」）之略稱，指德國。

<sup>11</sup> 荒川清秀：《近代日中學術用語の形成と傳播——地理學用語を中心に》（東京：白帝社，1997年），頁87-91。



個是來自西方語言的外來語，僅佔 0.68%<sup>12</sup>，而且儘管是外來語，卻幾乎採漢語的形貌。

明治初期正因為是知識分子所推動的啟蒙時代，啟蒙家、思想家的用語具有極大的影響力。至於學校教育所扮演的角色為何，則需要進行實證性的研究。

要弄清明治時代到底有多少譯詞被造出？其中又有那些遺留至今？並不容易。對當時每位翻譯者進行調查是可行的辦法，像手島邦夫就調查了西周。根據手島的調查結果，西周曾構想出兩百四十個雙字漢字詞。其中至今仍使用的詞彙有四十三個，約佔 18%（筆者統計）<sup>13</sup>。至於其他翻譯者，也有調查的必要，還有也必須探查譯詞消失或更替的原因。

## 六、完成之前的路程

明治時代，不只翻譯書籍，也大規模地編纂辭典和術語集。辭典和術語集不僅可從已刊行的書籍中選取新詞、譯詞，還可以集中創造譯詞，這是辭典不同於一般翻譯著作的重大特色之一。接下來討論對釐定譯詞貢獻極大的明治時代辭典、術語集的編纂情況。

要掌握明治時代辭典、術語集的概況，可利用《辭書解題辭典》（惣郷正明等編，1977）和《明治語辭典》（惣郷正明等編，1986）。前者收錄江戶中期至昭和四十九年之間出版的逾五千部辭典，而後者增收了惣郷後來收集到的辭典。雖然不算完備，不過大致能反映出這個時代的情況。筆者從這兩本書選出江戶年間至明治四十五年（1912）出版的辭典和術語集，選擇的標準限定在外語辭典、術語集、大型日語辭典等與近代語形成有密切關係者，而略去和歌、作文、簡明日語辭典、小型日語辭典、人名地名辭典等，合計得四百六十部，大致上可分為外語辭典、術語辭典、術語集、日語辭典、百科辭典等五類。具體數量依年代區分，如下表所示：

<sup>12</sup> 參照飛田良文：〈外來語の取り入れ方の變化〉，頁 29-38。

<sup>13</sup> 參照手島邦夫：〈西周の新造語について——「百學連環」から「心理說ノ一斑」まで〉，頁 1-13。

年代	部數
1868 年以前	26
1868-1877 年	65
1878-1887 年	79
1888-1897 年	62
1898-1912 年	228

以下從新詞和譯詞的創造、普及、定型等角度作簡單說明。

### （一）明治維新以前的情況

明治維新前出版的辭典工具書有二十六種。其中，《譯鍵》(1810)和《和蘭字彙》(1858)集蘭學譯詞之大成，對往後的譯詞創造產生了極大影響。英語的辭典，最早有《諳厄利亞語林大成》(1814)，實際上不過是一本小小的詞彙集。真正的英日辭典，還是要等《英和對譯袖珍辭書》(1862年初版，1867年增訂版<sup>14</sup>)和《和英語林集成》(1867)出現。但是就譯詞而言，前者主要參考荷語辭典，後者則以日本固有的「和語」為主，因此這兩部辭典都無法勝任明治初期英語書籍的翻譯工作。另外，還有幾部法語辭典和詞彙集出版。明治維新之前的外語辭典以荷語辭典為主，即使是其他的外語辭典，蘭學的譯詞也都占有極大的比重。

### （二）一八六八至一八七七年之間的情況

明治元年至十年出版的辭典、術語集激增為六十五種。外語辭典方面，英日、日英辭典共有十八種刊行。其中，《附音插圖英和字彙》(1873)從羅存德(Wilhelm Lobscheid, 1822-1893)的《英華字典》(1866-1869)和蘭學系統的辭典吸收了譯詞，對整個明治時代的英日辭典產生了巨大影響，這點尤值一書。明治維新之前的術語辭典，只有一部《砲術語撰》(1849)。但在明治的最初十年裏，共出版了二十三種。《解體學語箋》(1871)和《醫語類聚》(1873)一面繼承荷蘭醫學的詞彙，一面從在中國傳道的醫生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1873)的醫書裏吸收了包括「炎症」在內的術語。《化學對譯辭書》(1874)和《植學譯箋》(1874)都是該學科領域最早的術語集。此時，說明漢譯西書用語的術語集也出現了，從中可窺見漢譯西書的讀者層的擴大。此外還要注意《布令字弁》(1868)、《日誌字解》(1869)、《音訓新聞字引》

<sup>14</sup> 譯註：原文「同改正增補版一八六六」有誤，增訂版（改正增補版）出版年應為一八六七年。



(1875)等漢語辭典<sup>15</sup>。這些辭典收集了明治新政府的布告、法令以及報刊上所使用的漢字詞，而於明治初期大量刊行，在向庶民階層推廣、普及新的漢字詞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另外，也翻印了中國的英華辭典和出版了德日、法日辭典。

### （三）一八七八至一八八七年之間的情況

明治一〇年代出版的辭典、術語集有七十九種。以中國的英華辭典為底本而編纂的《訓譯華英字典》（永峯秀樹，1881）、《增訂英華字典》（井上哲次郎，1883）出版了。當時除了《附音插圖英和字彙》之外，合適的英日辭典還很少，所以這兩部特別受到人們的歡迎，而且為了因應大規模的翻譯、著述活動，術語集的編纂也在積極進行，共有三十四種問世。觀其細目，以醫學類（生理學、解剖、病理）有十種為最多，可知日本因具有荷蘭醫學的傳統，故能快速引進西方醫學。動物學、植物學的術語集也首次問世，但值得大書特書的是《哲學字彙》的出版（初版1881年，改訂增補版1884年）。永嶋大典指出：「井上哲次郎所編的《哲學字彙》（明治十四年），彙集了幕末到明治初期急速發展的人文學科專門術語，集重新整理的日語抽象語之大成（但這不過是小規模的詞彙集），對其普及有很大貢獻。」<sup>16</sup>《哲學字彙》確實如永嶋所說只是條列譯詞的詞彙集，但之後的《法律字典》（1884）和《教育心理論術語詳解》（1885）讓人注意到這兩部都是採用大條目編纂法的辭典，且嘗試用日語詳細說明術語的意義。網羅西方新知識的《百科全書》（1884）的出版，也是一件具象徵性的事件。中國的漢譯西書、英華辭典繼續傳入日本，但在其數量減少的過程中，值得注意的是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 1824-1880）的《英華萃林韻府》（1872）。該辭典的 Part III，由來華傳教士所編的術語集構成。這部分被改編成《英華學藝詞林》（1880）出版，為日本提供地理、數學等學科的相關術語<sup>17</sup>。

### （四）一八八八至一八九七年之間的情況

在明治二〇年代，辭典和術語集計有六十二種出版。外語辭典裏，英日、日英

<sup>15</sup> 收錄在《辭書解題辭典》的漢語辭典只是一小部分。參照松井利彥：《近代漢語辭書の成立と展開》（東京：笠間書院，1990年）。

<sup>16</sup> 永嶋大典：《蘭和・英和辭書發達史》（東京：講談社，1970年），頁100。

<sup>17</sup> 杉本つとむ、吳美慧編著：《英華學藝詞林の研究——本文影印、研究、索引》（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89年）。

辭典有二十一種，占全體的三分之一。《韋伯斯特氏新刊大辭書和譯字彙》(1888)被廣泛使用，但與明治前期的辭典相比，並沒有實質的進展<sup>18</sup>。有顯著進步的則是術語辭典和日語辭典。術語辭典計有二十四種刊行，《工學字彙》(1888)、《英獨和對譯礦物字彙》(1890)、《法律字彙》(1890)、《植物學字彙》(1891)、《電氣譯語集》(1893)、《英和數學字彙》(1895)等由各類學會所編纂的術語辭典，在彙整各學科術語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言海》(1891)、《日本大辭書》(1893)、《日本大辭林》(1894)、《日本大辭典》(1896)、《日本新辭林》(1897)等大型日語辭典也相繼問世。在這些辭典裏，可看到專業術語轉變為一般詞彙的傾向。漢語辭典和英華辭典在這一時期開始銷聲匿跡，漢語在詞彙方面對日語的影響遂告結束。

#### (五) 一八九八至一九一二年之間的情況

明治時代最後十五年間，辭典和術語集共出版兩百二十八種，呈現飛躍性的增長。英日、日英辭典出版三十七種，其中明治四十四年出版的《模範英和辭典》(神田乃武等編)，可謂明治一代學術詞彙的總結。術語集的刊行達一百三十九種，涵蓋了所有的學問領域。《日本百科大辭典》(1908)等大型百科全書也有數種出版。又如《哲學字彙》第三版問世所象徵的術語的整理、釐定工作也已列入日程。這個時期學術語的最大特徵，是外來語的顯著增加。伴隨英語的普及，學術詞彙開始從「譯」(創造譯詞)轉向「借」(直接借用)，在引進方法上有了巨大的變化。

## 七、結 語

《言海》所代表的近代日語辭典的出版以及各學科術語集的刊行，明顯表示近代日語詞彙的主要部分透過漢籍語和蘭學譯詞的繼承、漢譯西書譯詞的採用以及更重要的明治知識分子的努力，在明治二〇年代大致完成了，而言文一致運動也同樣在明治二〇年代取得豐碩的成果。到了明治三〇年代，飛快實現詞彙近代化的日語，開始向漢字文化圈輸出以學術語為主的新造詞。

二十世紀之後，中國透過日文書的中譯以及日本的英日辭典和術語集，大量吸

<sup>18</sup> 永嶋大典：《蘭和・英和辭書發達史》，頁 139-146。

收日製的新詞、譯詞。朝鮮半島同樣也借用日語，在短時間內完成近代語的整備工作。明治的學術語，就這樣成為漢字文化圈的共通用語，對亞洲的近代化貢獻良多。已邁入資訊化社會的今日，不只在學問的世界，即使在一般的社會生活上，用語的問題依舊存在。比方說，過度使用外來語，有害於和對方進行良好的溝通，因此日本的國立國語研究所提出了「替代詞語」（言い換え語）的方案。該所提出的「替代詞語」裏，含有許多漢字詞。為什麼要用漢字詞？漢字詞能比外來語還容易理解嗎？當我們思索這些問題時，回顧起明治時代學術用語的發展過程，一定能獲得有益的啟示。